

2022年6月11日是第17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

吉林非遗：

探寻家园、建设家园、扮美家园的创造历程

——与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孙桂林一席谈

□ 龚保华

水”，让古老的工艺获得新生。后来她在《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中写道：“……图样方面的循规蹈矩，师守成法，偏向无原则的繁琐精巧。工匠师傅们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制作出一些重要精致细腻的作品，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发挥出他们真正的创造力……它们必须是民族的，而重要的是它们必须是今天的。”（转引自林彬《林徽因传》）

林徽因的这段经历，足以让我们对非遗保护和传承有更深入的理解。

不少非遗项目常常在偏僻的乡村保存着完整的形态，那么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如何并行不悖、比翼齐飞？

“从长远眼光来看，城镇化要具有竞争力，避免同质化，保护和传承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优势。”孙桂林说，“同样，非遗要走进当下生活并活态传承下去，城镇化发展不应成为无解的障碍，而应视为释放活力的机遇。关键是两者如何达成共识，并从中找到并行不悖、比翼齐飞的起点和路径。”

在非遗传保护形成全社会共识的今天，通过20年的挖掘、整理、论证和四级名录体系建设，我省非遗家底基本摸清。那么如何描述我省非遗的创造历程？

如果要列举21世纪全球范围内重大的文化事件，毫无疑问，由政府推动、民众参与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定占据显赫位置。从2001年算起，我国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运行了20年。从文化主管部门的推动、相关专家介入，到民众由陌生到熟悉再到热情参与，以及多方面实践，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神秘，它的历史创造和现实存在，业已在民众头脑中得以有效衔接。非遗就在身边，“人人都是非遗传承人”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这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和传承路径及方式的认定奠定了基础，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提供了可能。

经过这20年四级名录体系的建立和本省五批项目筛选、国家六批项目申报，我省非遗的大部分家底已经浮出水面。现有国家级代表性项目55项，省级代表性项目433项，市、县级代表项目2000多项。能够在“移植”和“冲击”中绽放和传承的文化是强大的，所以尽管与项目数量庞大的省份相比，我省非遗体量不大，但特色鲜明。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项目所占比重较大，呈现出既有民族个性，又有不同民族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不仅类别齐全，也包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有形态。

那么这些非遗项目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又是如何穿越岁月的磨蚀传承至今的？孙桂林动情地说，吉林省非遗的创造历程是否可以这样描述：闯关东移民的涌入，蒙古族的放垦，一些少数民族的迁入以及流人的落脚，使移民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与当地满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相融相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民众在这探寻家园、建设家园、扮美家园的艰难创业过程中，创造并传承着这片土地上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些年，随着身边不少食品、用品进入非遗名录，越来越令人感觉非遗离我们很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何筛选？如何理解“人人都是非遗创造者”“人人都是非遗传承人”？

孙桂林感慨地说，非遗保护事业20年，我们都是学习者和探索者，一点一滴去感悟和领会。在田野调查、资料辨析和价值论证过程中，我的体会是：把“非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四个概念依次搞清楚，有关“神秘化”和“泛化”的困惑就释然了，很多问题就容易理解，也能够避免误解了。

这四个概念，放在一起按顺序排列起来，就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历程和非遗项目的筛选过程。疫情期间，不少朋友纷纷晒出自己用不同器具生出的豆芽菜，用已有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口味炒出的美味的菜肴……生豆芽菜和炒菜，一定是学来的，这是传承；而“用不同的器具”和“结合自己的口味”就是传承基础上的创造了。这种弥漫于生活当中的现象，每时每刻都在



国家级项目查干湖冬捕习俗——祭湖醒网仪式 梁冰 摄

发生，这就是“非物质文化”事象。它可能是稍纵即逝的，不被关注的；也可能作为一种民间技艺，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而留存下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样，“人人都是非遗创造者”“人人都是非遗传承人”就容易理解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物质文化”事象的基础上形成，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形成。它应具有完整形态，不仅流传、延续下来，还具备一定的规模，并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成为某一群体中的生活方式。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一定在相同的非遗项目中产生，在同类项目中具有代表性，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及其精神指向，因此列入四级名录中加以保护。

我省现有两个以非遗项目为主体的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查干湖文化（前郭尔罗斯）生态保护实验区、朝鲜族（延边）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那么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与以往的项目保护有什么不同？

整体性保护是非遗保护的中国方案，是中国的发明，是对项目保护方式的提升和完善。也就是说，整体性保护更注重非遗项目与生存环境的依存关系。不再把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割裂开来，不能把非遗项目固有的文化形态割裂开来。于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提上日程。

在文化主管部门推动下，在生态区所在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省的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正在分步实施。

整体性保护是一种理念，在此理念引领下的保护和传承方式，就会有所不同、有所调整。整体性保护除了硬件设施建设之外，也应包括文化生态区整体文化精神的提



人类口头和非遗代表作项目朝鲜族农乐舞（象帽舞） 梁冰 摄

炼。每一个文化生态区不仅是非遗项目得以活态传承，又能够熔铸一种精神符号，既看得见，又感受得到，并以输出价值观来扩大文化影响力，风景风情化，公园家园化，那势必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一条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除了保护传承文化的多样性之外，如何对当下民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产生影响？

谈及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除了常态化工



东北二人转项目国家级传承人王忠堂给徒弟传授技艺

作外，下一步还有哪些自选动作时，孙桂林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代代按照生活需要和生活理想进行传承和创造的过程，在挖掘非遗资源、抢救濒危项目、扩大传承人队伍等保护措施基本完善的基础上，非遗创造性思维的梳理和研究值得关注。如果说我省的非遗是在吉林这块土地上探寻家园、建设家园、扮美家园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面对同样的物质资源，在非遗传载体上，一定有值得总结的属于这一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的总结，对于当下和未来新业态的培育、产业结构的布局以及人力资源的挖掘和人才的使用等等，都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需要进行长期的、认真的、从“纵”到“横”、从“点”到“面”、从理论到实践的多维思考。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下一步计划开展省内四级名录项目的价值评估工程，先制订评估标准，然后分级分类开展项目评估；在对项目进行充分的价值评估的基础上，制订相应的保护、传承细则，分项指导、分步实施。同时，为传承人考核和传承人退出机制提供参考依据。

（本版图片由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提供）



白山松花石雕刻技艺省级传承人、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张添新作品《铮骨碗》



长白山满族剪纸国家级传承人倪友芝作品

吉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丽多姿，源远流长。吉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踏实前行，任重道远。这是一个探寻家园、建设家园、扮美家园的创造历程。对此，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孙桂林有着深刻的体会和独特的理解。

从2006年开始，每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都拟定一个主题。那么，如何理解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以其美好的姿态，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今年设立17年，每年确立的主题都具有针对性。或强化保护理念，或提供保护路径，或指出存在的问题，对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2016年“文化遗产日”的时候曾明确提出了“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的口号，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又着重强化“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主题，可见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是非遗活态保护和传承的根本路径。而提出这一口号和强化这一主题说明两点：一是大家有了一个基本共识，只有融入现代生活，才能激活传统、让传统发挥现实作用。第二，说明了在融合上做得还不够，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还要寻找更为契合的方式。

那么，非遗如何很好地融入现代生活？孙桂林认为，归根结底，还在于对非遗属性的认知，和对这种认知的坚守上。

“非遗是什么”？尽管非遗项目类别复杂，但是非遗具有统一属性。非遗保护就是以释放项目的文化价值来实现其经济价值、精神价值，文化价值越高，经济附加值越大，精神价值越厚重，项目传承越持久。

基于多年的非遗保护实践，孙桂林说，比如我们可以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入草编项目中，但如果没有规范的传承，不仅技艺得不到延续，文化价值和个性也可能消弭殆尽。一项技艺衍生品的文化价值稀释掉了、个性消失了，经济价值也不复存在。所以说，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市场化仅仅是非遗保护与传承某一环节上可以选择的手段，且前提是不能以稀释文化价值为代价，做透支开发和短期消费，否则与我们非遗保护的初衷南辕北辙。

这就过渡到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层面。如果以商品的概念来定义非遗，那么这些农耕时代的产品、手艺，是不是网络时代所需要的？从这个角度看，一些非遗衍生品因为没有高科技产品那么便捷、那么多功能，慢慢是否会变得不需要？但是它的文化价值及其精神享受和个性化生活引领功能却可以穿越时空，从农耕时代直达网络时代，为现代人所接受、共享并成为创造新生活的动力。

有了认知上的共识，才会根据各地人文习俗，寻求打开和融入现代生活的路径和方式。

非遗保护工作者对非遗属性应有统一的认知和坚守，非遗传承人也应应对非遗属性和自身的传承有更深的体验与顿悟。在此，孙桂林特别提到了当年林徽因抢救景泰蓝的一段经历——在目睹了北京景泰蓝被丢在古董市场一角无人问津的境况后，林徽因以敦煌飞天图案“试

文学大家孙犁以散文集《白洋淀纪事》、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为代表作，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荷花淀派”奠基人的地位。与他的作家生涯相伴的，是他丰富多彩的读书生活。

孙犁一生对书“珍如拱璧”。他嗜书如命，幼年时就养成了读书、爱书的好习惯。孙犁在上小学时就爱读书，学会了给书包封面，这个习惯伴随他一生，而且，到了晚年还创造出一种新的文体——“书衣文”。他晚年出版的《书林秋草》《书衣文录》和《耕堂读书记》，读来令人颇受启发。他的这些“书衣文”，内容丰富、自由随意、精短隽永，或为读书札记，或记述他的读书生涯与读书乐趣，深受读者喜爱。阎庆生教授评论说：“这是孙犁在荆棘丛中为自己开辟的一条可致幽远、休养生息的小径，也是为自己打造的一叶顶风破浪的扁舟，还是他独创的、饱蕴文化意味的工作平台。”

孙犁晚年集中思想了不少书，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孙犁曾说：“我对书有一种强烈的、长期积累的、职业性的爱好。一接触书，我把一切都会忘记，把它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觉得是至上的愉悦。”（《装书小记》）1974年4月，孙犁在包《西游记》的书皮上写过一则《书箴》，可以看作是他的读书宣言：“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这“四勿一高”，是孙犁长期读书生涯的经验总结。

孙犁读书、爱书、惜书、包装书的习惯一直没有变。一有空闲，他就会整理自己那些心爱的书。在1978年春写的《装书小记》中，他深情记述了对茅盾新版《子夜》包装的经历：“最近，《人民文学》编辑部赠送我一本新版的《子夜》，我就利用原来的纸封，给它包上新的书皮。这是童年读书时期养成的一种爱护书籍的习惯，一直没有改。遇到心爱的书，总得先把它保护好，然后才看着舒心放心。”对于一些旧书，“我差不多无例外地给它们包裹了新装，也是利用一些旧封套，这些工作，几乎持续了两年之久。”因为，“包裹书籍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平静，很是愉快的。”这种专心致志地修补旧书的过程，就和妇女们“织毛活、补旧衣一样，确实是很好的休息脑子的。”

孙犁读书广泛驳杂。作为一名作家，他主张“多读一些历史书，不要总读文学书”。除古典文学、中国史书外，诸如农桑畜牧花卉、金石美术图画书也都读。虽读书范围广泛，但对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孙犁有自己明确的主张。他主张读书要有基本的原则，要精选，读有用的书。“人的一辈子，虽是爱书的人，书也实在读了不少，所以我劝人读选本”。他称：“平生读书是为了增加知识，探求文采。”同时，他还坚守读书的原则，“不读浅薄无聊之书，不看下流黄色小说，不在这上面浪费时光”。孙犁曾经说过，一个作家有没有文化，不是看他读了什么书，而是看他建树了多少文化，给文化积累增加了多少新的内容。

孙犁晚年出版的经典作品《耕堂劫后十种》就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孙犁把整理书籍看成是“很好的休息脑子的”。因此，在与友人的书信里，孙犁也不忘把自己读书、惜书的乐趣拿出来分享。他1994年1月20日致信卫建民：“我近来的工作是：每天站在书柜前，观察包扎旧书的报纸，如有太脏太旧，则取出重新包装之。”那种乐此不疲的愉快心情溢于言表。对于书顶变黑，孙犁也有独门绝技加以整治，“铅印平装或精装，立着放久了，书顶即变黑，整治之法：用细砂纸打磨之，就干净多了。我近用此法，修整商务旧版书多种，颇为得意，也证明我爱书之情，至死不渝了。”（《曲终集》）

读书，包装残破的书，给了孙犁无穷的精神力量，使他成了“有生之年，就是爱书之日”的著名藏书家。他的“书衣文”是真正的书话，不仅仅记录着他读书的“心情行迹”，更多的是对当代文学作品的品评，是一部部真切动人、博采独特、启人心智的读书笔记。

孙犁和他的『书衣文』

□ 胡志伟